

# 批判理論與福利意識形態

## Habermas 觀點的討論

王順民

本文原文為：「Critical Theory and Welfare Ideology」。作者為Martin Hweitt。取材自Welfare, Ideology and Need: Developing Perspectives on the Welfare State 的第六章 PP. 95-117。文章採取是「編譯」的方式，一方面先流覽該文的大要，再加上其它的參考文獻，整理成爲一篇獨立的文章。

### 前言

相對於馬克思學者的政治經濟學分析，批判理論將其關懷的旨趣放在：人類生存的規範性指稱上（normative features of human existence）——包括對於真理（truth）、自由（freedom）與正義（justice）的追求以及社會、經濟條件所給予的限制。

整體來說，批判理論強調的是：資本主義社會內在的危機情境會阻礙人類對於真理以及完善、自由社會的追求。事實上，這也蘊涵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對於有關「完善」（goodness）以及「自由」提供了另外不同的價值宣稱。總之，有關資本主義的「福利國家」建制成爲批判理論中心議題，而他們終極的目的是想要揭穿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上的扭曲（ideological distortion），從而爲人類的解放（human emancipation）提供不同的價值思考。

本文旨在處理福利國家對於「意識形態」與「福利國家」之間的論述，而我們又集中在對Habermas 的身上。簡要的說，Habermas 認爲資本主義社會的「意識形態」本身是一種扭曲的溝通，但是，藉由這種扭曲的溝通可以爲社

會運動創造出新的關懷旨趣（interest）。因此，Habermas 的貢獻正是嘗試著從廣泛的政治經濟範疇中，來陳述有關「福利」與「意識形態」的哲學性思考。藉而論證出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危機傾向」（crisis tendencies of late capitalistsociety）。

以下，我們將先爲以後的論述提供若干知識背景上的說明。當然，這些的說明基本上，還是從Habermas 的觀點出發的。

有關批判理論的社會批判（social critique），其論述的重心爲：

1. 試圖去揭示資本主義社會（bourgeois society）的理念（ideals）與實際建制（institutional practice）之間的不一致性（discrepancy）。以我們的例子來說就是，當我們宣稱「福利國家」的建制其基本目的是在提供所有人民相同的公民權時，但是，事實上僅有少數的人才享有該項的權益。

2. 批判理論不同於其它理論的地方在於：透過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價值的批判，進而提出另外不同的價值規範（a sense of emancipatory human values）。

顯然，上述兩種理論是一種互爲辯證的邏輯關係。亦即，一方面對於現有社會制度的批判；另一方面則是提出相對於資本主義社會價值的不同思考。

就當代批判理論學者來看，Habermas 的研究符合上述兩種理論。首先，Habermas 對於「意識形態」的指稱，提出「理想的言談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以及「系統扭曲的溝通」（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

tion) 一組相對性的概念。其中，前者強調的是如果一個公開而沒有干涉阻礙的論述 (discourse) 成為可能的話，那麼，一個「理想的言談情境」將可以順利地運作。但是，現實情況卻不是如此，因為行動者往往是基於一種「虛假意識」(false consensus) 而進行「偽溝通」(pseudo-communication)。如此一來，往往必須借助第三者 (third party) 來重新釐清、找出這種曲解溝通的起源。

總之，Habermas 的理論觀點不同於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地方有：

1. Habermas 引借 O'Connor 有關「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 的概念，用以說明有關危機的形成 (generating)、拖延 (deferring) 以及轉換的過程 (transforming)。對 Habermas 來說，社會中某一體系所產生的危機是可以由其它體系來加以替代的 (displace)。亦即，危機是可以轉移的。

2. 因此，我們可以對危機的處理必須作比較細部的考察，而不是像過去政治經濟學的論點視危機是不可避免、無法逃脫的。這裡對 Habermas 理論詮釋的意義性乃在於：一種新的意識形態興起潛在的可能性，藉以扮演協調 (mediation) 的角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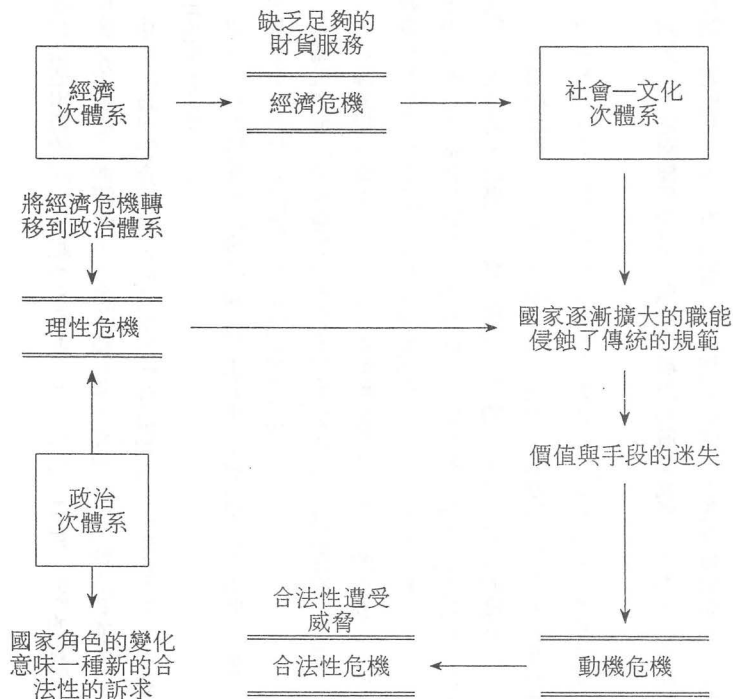
## 有關福利國家的危機

(The Crisis of Welfare State)

Habermas 將成熟的資本主義社會畫分成三種不同的體系、功能，它們分別是「經濟體系」、「政治—行政體系」以及「社會—文化體系」。而我們也可以根據「危機傾向」的類型來區別出每一種的體系。比如「經濟體系」裡，當未能有足夠有效的價值物產出時，會出現所謂的「經濟危機」(economic crisis)；而在「政治—行政體系」裡，也因為缺乏合理可信的決策，而會出現「理性危機」(rationality crisis)；當然如果國家還是繼續無法滿足人民的需求，而喪失人民的支持時，就可能形成所謂「合法性危機」(legitima-

tion crisis)。最後，在「社會—文化體系」中，過去寄存於家庭、宗教所形塑的價值、象徵物，將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漸趨瓦解，以致於形成「動機危

〔圖一〕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傾向：



取自 Peter Taylor-Gooby and Jennifer Daie :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Welfare . p243

機」(motivation crisis)。總之，當某一體系的需求 (demand) 超過其所能提供的範圍時 (inherent resource)，就會形成「危機」，最後，不是導致該體系的崩潰瓦解，就是將危機轉移至其它的體系。我們試著以圖示來簡化上述的論述。

底下，我們將進一步說明 Habermas 對於「福利國家」中有關「合法性危

機」與「動機危機」之意識形態層面上的討論。

首先，Habermas 延用 O'Connor 的概念，直接質疑資本主義企業的競爭本質，包括有：不顧及資源本身的稀有性、不採行公義式的配置方式以及強調市場機能的運作原則等等。如此一來，犧牲了人類的需求和福祉而被用來彌補市場運作所帶來的災難。最後的結果是：原初人們經濟性產出的價值後來與社會性的需求彼此之間沒有任何理性的關聯，因為，僅有少數人的需求被滿足，但是，卻有大多數的人被剝削。

顯然，當「經濟危機」成爲一種客觀事實時，勢必要將其轉換至其它的體系，以保有「經濟體系」得以繼續地運作。也就是說，此時「政治—行政體系」接手該項燙手的難題，而必須在資本家的利潤以及一般人民的利益之間作理性的選擇。引用 O'Connor 的概念，這時國家慣用採取的策略有三種：一是「社會資本」；二是「社會費用」；三是取代若干以市場機能爲主的商品供給（用「使用價值」的概念取代以往「交換價值」的概念）。其中，在「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方面，政府部門可能是以直接方式像融資信用貸款、各種公共計畫來刺激資本家的投資信心（這一部分的費用支出 O'Connor 稱爲「社會投資」（social investment））；但是，也可能是用間接的方式，像是培訓自由市場所需要的勞動技術或者是對失業人口提供失業津貼等（這一部分的費用支出 O'Connor 稱爲「社會消費」（social consumption））。但是，無論如何，歸屬於「社會資本」的項目，基本上，直接或者間接地都是有利於資本家的利潤追求（資本積累）。

至於，在「社會費用」（social expenses）項目裡，該項支出主要是用於社會上的非勞動的弱勢人口群身上。也就是說，該項福利供給的目的並不是爲了未來勞動力的投資，而是爲了維持、確保社會的和諧。（更進一步的論述，詳見王順民譯：「三種福利國家的理論」，社區發展季刊第六十一期）

然而，由於缺乏技術以及市場資訊，而無法制定出合理的經濟方案，致使

「理性危機」的可能性增加。以「福利國家」的例子來看，當種種社會化制度、措施不斷的提出而導致成本持續的上漲時，福利國家卻又必須提供更多的福利供給以實現保障人民的公民權與維護社會正義的承諾。其結果是：這種強調「資本積累」以及「正當性」的建制設計，勢必會爲「政治—行政體系」帶來更多的危機。這時「合法性危機」已經取代了「理性危機」。當然，最後，勢必又會轉換至「動機危機」，亦即，個人以及社會的認同問題（individual's person's and social identity）。至此，一個要求更爲普遍性正義標準的社會運動因應而生，比如婦女運動、綠色和平運動等。

## 有關福利、道德與普遍性

（Welfare, Morality and Universality）

隨著福利供給範圍的擴大，導致福利政策領域的擴充以及必須重新界定國家（state）與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之間的界限。這裡蘊涵的意義是：對傳統權威的挑戰。比如「福利國家」的方案取代了過去家庭、社群所扮演的職能以及上述的福利供給所帶來對市民個人領域（civil sphere）的侵犯。最明顯的例子是由於強調對兒童的保護與照顧（childcare），使得社工人員被授權得以監督父母的管教行爲，致使父母的權益受到威脅。

因此一旦傳統的價值規範受到挑戰、威脅時，「合法性危機」就顯得特別嚴重。而此時「福利」就被視爲是一種「萬靈藥」，可以用來重新建構整合性的集體形式以及社會的凝聚力，藉以回應工業發展所帶來的文化性困境。

然而，如果是從右派（the Right）的觀點來看，卻有不同的詮釋方式。他們認爲一旦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無法繼續在後資本主義社會保持優勢時，就可以被當成是一個理由，藉以鼓動「福利國家」採行回復過去傳統道德生活的制度設計。也就是說不再強調普遍、共同性的標準（universal），而是個別性的價值標準（selective）。連帶所引發的議題思考是：福利供給所帶來的縱

容行為 (permissiveness) 以及所謂的「福利依賴」(welfare dependency)。右派對諸如此類的問題的解決對策是引介社會工作專業的知識，藉以區別出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口群。

但是，Habermas 直接質疑「福利國家」回歸傳統德目的企圖。因為如果那麼做的話，勢必會誘發更多的爭論，這是因為人們還是（或者說是已經慣於）採取普遍性的標準規範 (moral universalism) 來看待這樣的轉變——將責任由國家手中轉移至家庭或社群的身上。如此一來，終將會引發前面所說的「合法性危機」。

## 有關福利、真理與論述

(Welfare, Truth and Discourse)

首先，我們先簡介 Habermas 的「溝通行動理論」(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以作為底下討論的基礎。

面對「了解 (understanding) 如何可能？」的議題，Habermas 提出「普通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 作為溝通行動理論的基礎。強調說話者 (speaker) 如何以一種可被接受的方式說出合乎文法的句子，並與聽者 (hearer) 建立彼此認同的人際關係。如此一來，說者與聽者之間互為主體的了解與溝通才有可能。進一步衍生出來的意涵是：作為一個社會行為的個體 (social actor)，其言辭行為 (speech acts) 必須會受到「溝通行動」的限制，同時，也正因為這種要求言辭行為之間可相互預期的約束力 (binding force)，而使得彼此的行動會受到調合，藉而達到社會凝聚 (social cohesion) 的目的。

因此，Habermas 所指涉的「言辭行動」意味著「有效宣稱」(validity claim) 的存在。這裡，Habermas 進一步區分出三種不同類型的「有效宣稱」：

1. 「真理性宣稱」(truth claim)：指涉的對象是客觀性的實體 (objectivity) 而要求一種理性的認知方式。最常見到是一般科學性的論述。

2. 「規範性宣稱」(normative claim) 指涉的對象是有關社會關係與制度的「適切性」(rightness) 問題，要求的是一種常規性的理解方式。最常見到的是有關道德上與政治上論述。

3. 「真誠性宣稱」(truthfulness claim)：指涉的對象是有關個人主觀情感上的「真誠性」問題。因此，要求的是在溝通的表達過程中「真誠」的理解方式。最常見到的是說話者真誠地表露自己的意向，以取得聽者的信任。

總之，Habermas 肯定每一個人都具有「語言能力」(linguistic competence)。因此，不僅能夠說出有效合法的述句，還能夠依照上述的語句規則：「真理性」、「適切性」與「真誠性」，來與他人建立起合法的人際關係。將上述三種不同的宣稱，扣聯著「福利」議題的討論時，我們可以得出：

1. 就「真理性」而言：福利政策制定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個人、群體以及社會大眾的需求 (need)。

2. 就「適切性」而言：福利政策本身也隱涵著福利資源配置的適切性問題。

比如那些人才可以享有福利？福利供給的形式應該是選擇性的還是一般性的？

3. 就「真誠性」而言：在福利給付過程中，同時也涉及到案主本身對其需求的表達以及社工員提供幫助時的真誠性問題。

總之，Habermas 企圖透過「理想的言談情境」——係指一種不受到制約的理性的、公平的對話情境，以及「理性的重建」——係指一種不被某一利益團體牽制的理性，以使「自由」、「真理」與「正義」得以體現。同時，正是在這種基於理性共識而進行的「反覆性論辯」(discursive argument)，使得資本主義社會所呈現出來的「正當性」——包括「科技主宰性」(technocratic mastery)、「工具性」(instrumentality)、「公正性」(impar-

ity) 以及「福利慈善性」(welfare benevolence)，方得以一一地被檢視、拆解。而終極的價值更在於揭穿高度資本主義社會發達下所造成的意識形態的扭曲(ideological distortion)。

連帶地，過去所強調的個別選擇性的福利供給勢必會受到質疑。這是因為「溝通理論」認為在一般普遍性的福利供給中，由於沒有顧及到個別的收入、階級、種族與性別上的差異，因此，個人被鼓勵對社會性需求進行理性的政治性論辯，從而不會形成所謂的「系統扭曲溝通」(systematically distorted communication) 換言之，普遍性的福利供給形式將有助於民主政治的推動。

## 有關福利國家與生活世界的殖民化

(The Welfare State and the Colonisation of the Lifeworld)

顯然，Habermas 對於「合法性危機」的預測並沒有得到證實，相反地，結構性以及意識形態上的力量，依然持續發展著，並且也消弭了所謂的危機與緊張。從另一方面來看，也可以說是一種新的福利國家的意識形態共識相應而生。這裡面包括對於「經濟成長與福利支出」、「福利國家再分配的機能」、「國家的正當性」以及「父權主義運行」等等議題的重新思考。

事實上，對於「福利意識形態」(welfare ideology) 的批判與反省，一直都是Habermas 論述的重心之一。而所謂的「福利意識形態」——意指「生活世界的殖民化」(the colonisation of the lifeworld)，Habermas 也一直將它扣聯到二十世紀社會學幾個學派所關懷的旨趣上。這其中包括Weber 的「解除魔咒」(disenchantment)、Marx 的「社會生活的商品化」(the commodification of social life) 以及批判理論對於宰制形式(domination) 與自由淪喪的思考等。

這裡，Habermas 也看出在現實社會中，政治與經濟體系對於溝通行動以及社會整合的宰制。但是，Habermas 更進一步地試圖檢視這種經濟、行政體

系對於社會生活世界逐步漸進的侵蝕(int intrusion)。因為，對Habermas 而言，生活世界的意義是在於：提供人們相互之間的溝通以及行動的背景世界。基本上，生活世界是「純真的」(implicit) 與「先於批判的」(pre-critical) 亦即，生活世界就是作為共享社會行動的必要條件，同時，它也是「真理的」、「適切的」以及「真誠的」三個宣稱的安身之處。

然而，隨著現代性(modernity) 的變遷發展，經濟與行政體系成為不可避免的機制設計時，專業制度化的知識形式取代了過去傳統的知識形式。對人們來說，這也意味著生活世界的「真純性」以及過去共同的「背景世界」被逐一地侵蝕。Habermas 將這種現象理解為「社會體系」：基於一種策略性的行動模式(strategic action)，取代了過去的「生活世界」：基於一種溝通的行動模式(communicative action)。同時，生活世界也不再純真如昔，而是包括各種不同形式的理性。總而言之，至此，生活世界的意識形態已經被拆解成「片斷」(fragmentation)，而形成各種不同意識形態：像是「社會主義」、「社會民主政治」、「保守主義」以及「法西斯主義」等，藉而開展十九、二十世紀以來各個社會生活世界(國家)各自不同的生活經驗。

總之，在「現代化」的階段，由於經濟與行政體系形塑出更多的「專家理性」(expert rationality)。因此，一種新的意識形態的「具現」(reification) 使得個人從其生活世界中被抽離出來。同時，在這樣一個客體化的現代世界中，人們所體驗到的將會是：個體被當作「事物」(thing) 而存在著，亦即，透過貨幣與權力的媒介，使得一個人被管理著以及被商品化。連帶地，隨著各項領域專業、分殊化的理性發展——包括科學領域、道德領域以及藝術領域等，而使得人們徹底地與其日常生活經驗相隔離(detachment)。

從Habermas 的論述中，得出在現代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操控下：勞動的商品化、行政的科層組織化以及民主政治的形式規則，阻礙了理性的重建。因此，「福利國家」的建制設計就被用來作為解決難題的工具。比如面對意外事



件、疾病、失業、退休、年老、貧窮以及無住屋時的一種對應策略。當然，你也許認為透過福利的供給，擴充了人民的公民權益，但是，殊不知上述種種的福利制度背後隱涵更多的問題。比如固然強調人民的公民權益，但是，由於福利的給付是以一種選擇性的、「財力調查」以及高度管制的形式出現，因此，為了該項的福利供給，往往帶來的是組織龐大的「福利科層」(welfare bureaucracy)。最後，反而必須接受這種「國家理性」(state rationality)的制約管制。因此，終極地來說，人民需求或者權益的體現，最後反而帶來對於生活世界中所共享的生活經驗與溝通的侵犯與傷害。

顯然，對Habermas來說，「福利國家」僅是被視為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用來使生活世界「殖民化」的一種手段。因此，所謂資本主義危機的本質正是來自「福利國家」在「補償職能」(compensatory function)與「具現職能」(reification function)之間的衝突所導致的結果。這是因為前者是為滿足人民的需求而提供的福利供給；但是，後者主要的目的是在強化「宰制」(domination)與「抽象化」(abstraction)的程度。基本上，二者呈現出一種相互抵觸的辯證關係。也就是說，一方面擴充了人民的公民權益(civil rights)，但是，另一方面導致理性的與管制的律法形式的普及化(pervading legal forms of rationalisation and control)。Habermas將此一情形稱為「自由掩護律法」(freedom guaranteeing juridification)。亦即，剛開始透過律法來保障個人的權益——特別是對弱勢者的補償，但是，最後的結局是個人必須遵守律法的規定，而這種律法體系——合法化的社會干預(social intervention)會侵犯到生活世界中的價值理念、個人自由的溝通以及對生活目標的追求。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所謂人民集體權益的擴充與行使——特別是指勞工「團體權」、「團體交涉權」以及「團體行動權」，往往的下場是將「律法」(juridification)帶進(侵犯)個人私有的生活領域中。

是以，「福利國家」的危機背後隱含的就是一種社會整合的危機。事實上

，這種內在性的矛盾(inherent contradictions)無怪乎會招致「右派」與「左派」的圍剿。其中「左派」的立場是倡導福利權(pro-welfare)，企圖以一種新的現實主義來取代傳統社會主義的信念，而將「福利國家」的設計與現代資本主義的體制結合起來；但是，「右派」的立場則是主張除卻國家的責任以及資本家的負擔，以便於開展出另外一種新型態的資本累積。當然，對Habermas來說，這兩種看法由於都未能顧及集體大眾的利益以及生活世界中較少的被侵犯(a collectively better and less endangered way of life)，因而「右派」與「左派」它們二者都無法提出可行的對策。

## 有關福利與社會整合的再現

### (Welfare and the Renewal of Social Solidarity)

藉由以上的論述，我們得出「福利國家」所面臨的兩難處境是：一方面致力於公民權益的推廣，藉以達到社會整合的目的；另一方面則由於貨幣與權力的行使，使得經濟與行政體系形塑出自我運作的法律規定與正當性，亦即，達到一種「自主」的形式(autonomous form)。如此一來，經濟與行政體系反過來對社會整合產生制約、削弱的影響。總之，對一般人民來說，為了保障個人社會性需求的滿足，因此，「福利國家」在他們眼中成為是一種合法、正當的機制設計，也可以說是出自他們生活世界本身所認同、賦予的一種機制設計。換言之，「福利國家」具備了「規範的正當性」(normative justification)以及「民主程序上的合法性」(democratic legitimation)的特徵。然而，最後的發展是「律法」取得運作上的自主性，以致於造成各種體系「理性化」規則與生活世界中的溝通行動彼此之間的相互對峙(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norms of system rationalisation and lifeworld communicative reason)。或者說是這是一種生活世界中的「溝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與行政體系中的「策略理性」(strategic rationality)之間的折衝與抗衡。

對Habermas來說，上述這種兩難情境是政府本身無法化解的。這裡意味著：政府不能再將新的法律、經濟與行政體系的規章加之於人們的生活世界。再者，人們的生活世界本身也自我形成一種新的對抗入侵的形式，進而一種新的社會運動形式因應而生，藉以共同關懷某項生活世界的文化現象——比如對於「婦女解放」、「環境保護」以及「世界和平」的關注。對於諸如此類的社會運動，我們可以說這是對生活自主形式的保以及新的集體認同的提升（the preservation and enhancement of their distinct domains of lifeworld）。最後，立基於這種「溝通德目」（communicative morality）的理性基礎，人民才可以要求行政、經濟體系在其政策、供給與實際運作時，回歸到原初生活世界的「規範的正當性」（normative justification）。

當然，從這個角度來看，「福利國家」好像提供了一個空間，使得人民可以闡述所關懷的旨趣以及倡導溝通行動的價值與規範。然而，真實社會的情況不是如此！因為，只要現行任何一種社會福利制度正在進行時，那麼，想要在公共領域中，達到「理性的重建」，那將會是一項艱鉅的工作，因為，它必須要統攝調合各種不同的利益團體，以謀求出一種普遍性的社會規範（a universal justification of social norms）。顯然，那會是多麼困難的工作！

## 有關Habermas的意識形態理論：一種評價

### （Habermas's Theory of Ideology: An Assessment）

Habermas對於意識形態的分析旨在於揭穿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虛偽意識，一種所謂的「系統扭曲的溝通」。同時，為了防止這種對資本主義社會內在性的批判（immanent critique）流之成為相對主義（relativism），Habermas認為批判理論本身需要堅實的基礎——一種來自哲學上的基礎（philosophical foundation），藉以建構出批判的判準（critical judgements）。我們上面的說法就是：確認一種免於任何宰制形式的理性論述，以作為建構真理宣稱

——「真實的」、「適切的」與「真誠的」——的先決條件。同時，任何有關某一特定的社會性論述，其有效的判準，也是以「理想的言談情境」作為標準，從而展開對意識形態扭曲的批判。

然而，這種對意識形態細膩且又有力的批判，也存在著若干的問題：

1. Habermas試圖以「理想的言談情境」作為共識的基礎，藉以尋求真理的宣稱，然而，有關「檢證」（verification）也是Habermas不能迴避的問題。這包括有：所謂真理的宣稱是否是在共識（at consensually）中達成？而這種的宣稱主張又是否就是真實的（true）？顯然，Habermas必須冒的風險是：有關共識預設的「虛幻性」（vacuity）連帶地，我們也必須說服自己去接受Habermas的看法，像是：以「溝通行動」作為建構真理理論的充分條件？溝通的行動意涵著一種對共識的欲求？以及有一種無形的力量以趨使行動者去追求真理？

2. 其次，立基於真理理論的批判，可能會過於將意識形態式視為是負面的（negative），一種對於真理的否定（denial）。也就是說，可能忽略了意識形態若干正面的特徵（positive features）。這裡的意義在於指出：對於意識形態的討論應該是存在於一種「真理」與「扭曲」並存的複雜論述中。然而，Habermas採取否定觀點的批判，過於假定意識形態彼此之間是封閉、互不對話的。進而，將意識形態視為是一種「絕對的」、「單一的」「系統扭曲的溝通」。至此，斬斷了意識形態「預示的功能」（prefigurative function），一種對於社會正義的思考與反省的能力。

3. 最後，有關「具現」（reification）的問題。Habermas將「具現」等同於是意識形態的展現。其結果是個體的意識被片斷性的拆解（fragmenting）。但是，Habermas並沒有進一步說明：在一個飽受「專家理性」侵犯的生活世界裡，個人又是如何維護個人自我的認同（personal identity or self-image）。連帶地，如果日常生活的意識喪失了綜合的能力，那麼，批判理論所

強調對於虛偽意識的批判又如何可能？當然，我們知道Habermas最後提出以「理想的言談情境」來化解所謂的「系統扭曲的溝通」。

## 有關合法化與現代福利國家

(Legitimation and the Modern Welfare State)

批判理論對於「福利國家」危機的討論主要是從個人需求與國家需求之間的矛盾、對立作為其鋪陳的主線。於是，為了滿足個人的需求，而致使國家的職能不斷地被擴充時，所有個別私有領域的問題都予以政治性的處理（轉移成為公共領域的範疇）。如此一來，造成各種的宰制形式阻礙了人們的生活世界與國家之間的關聯互動。也就是說，有關國家的「合法性」主要是取決於政治行動，而缺乏共同享有的背景世界。自然出現了所謂的「合法性危機」(legitimation crisis) 因此，各種正當性(justification) 或者化解的手段就必須因應而生。這其中包括採行「福利私有化」的策略(welfare privatisation)，一種所謂「公共領域去政治化的策略」(a strategy of depoliticising the public realm)。

然而，這種私有化的策略表面上雖然增加了消費者選擇的機會，亦即，擴大了人民的權力(權益)，但是，背後隱含的是一種責任的推卸。將責任從國家政府的手中推卸到地方機構，乃至於消費者個人的身上。換言之，所謂的「私有化」或者「福利多元主義」(welfare pluralism) 本質上，是相應於「政府失敗」(government failure) 所採取的一種策略性手段。

當然，就「福利國家」的發展事實來看，我們也可以質疑Habermas若干的推論。這其中包括有：質疑Habermas對於溝通了解(communitive understanding) 過於充滿信心；再者，大眾集體的意見也可以抗拒「福利國家」所採行的改革措施；最後，一種新興的共識(growing consensus) 也具有凝聚形成的可能性。

## 代結論

本文嘗試著從批判理論——特別是Habermas的觀點，提供對於「福利意識形態」不同的思考進路。在行文之中，作者主要是從Habermas的「溝通行動理論」出發，直指一個「理想的言談情境」，藉以達到「理性重建」的目的。當然如果能體現這種「理想的言談情境」，那麼，所謂資本主義社會意識形態的扭曲(ideological distortion) 自然可以加以揭穿。

連帶地，就福利意識形態的討論，Habermas從「生活世界」的觀點出發，指陳出來所謂「生活世界的殖民化」(the colonisation of the lifeworld) 的概念，藉以論證個人私有生活領域的被侵犯，從而被管理著以及被商品化。因此，所謂「福利國家」的建制設計就被用來作為解決難題的工具，或者說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用來使生活世界「殖民地」的一種手段。連帶地，從批判理論或者Habermas的論點來看，之後所採行的「私有化」策略，基本上也是為了化解「福利國家」的困境(「政府失敗」)而發的，其目的也不是為了人民真正的福祉。

## 參考文獻

- 王順民，一九九三，「三種福利國家的理論」，社區發展季刊第六十一期：一六七—一七二。
- 李英明，一九八六，哈伯馬斯。台北：東大圖書公司。
- 黃瑞祺，一九八五，批判理論與現代社會學。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Taylor-Gooby Peter and Jennifer Dale, 1981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Welfare. London: Edward Arnold Ltd.